

gu-hanyu
wenxueyuyan
cihui gailun

古-汉语 文学语言词汇 概论

孙常叙  著

总论

古-汉语文学语言词汇和现代汉语的关系

古-汉语文学语言词汇的语言性质

古-汉语文学语言词汇的语言特点

古-汉语文学语言词的判定

分论

古-汉语文学语言词汇的书写形式、

古-汉语文学语言词汇的语音形式

古-汉语文学语言同音词在书写形式上的假借和通假

词义

古代汉语造词法

古-汉语文学语言中的典故、成语和固定词组

gu-hanyu
wenxueyuyan
cihui gailun

古-汉语
文学语言词汇
概论

孙常叙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汉语文学语言词汇概论/孙常叙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 12

ISBN 7-5326-1906-0

I. 古... II. 孙... III. ①汉语—词汇—研究—古代②文学语言—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H131②I0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7421 号

责任编辑 徐祖友 宋 岚
封面设计 杨钟玮

古—汉语文学语言词汇概论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www.ewen.cc www.cihai.com.cn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9.25 字数 240 000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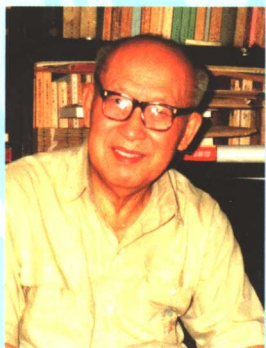
印数 1—3 500

ISBN 7-5326-1906-0/H·258

定价: 25.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21—66511611



孙常叙 又名孙晓野，祖籍河北永平府乐亭县，1908年12月26日生于吉林省吉林市。曾任中国语言学会理事、全国高等院校文字改革学会顾问、吉林省语言学会理事、吉林省美术家协会理事、吉林省第五届政协委员、吉林省社联副主席、吉林省文史馆长、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名誉系主任等职。1994年1月23日在长春逝世，享年86岁。著有《汉语词汇》、《龟甲兽骨文字集联》、《孙常叙古文字学论集》、《楚辞·九歌整体系解》等。

本社已出版的 语言学、辞书学图书

词典论

字典论

语义学与词典释义

当代语言学与词典创新

计算词典学与新型词典

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

词典释义的规范化进程

汉语词汇结构论

现代汉语异形词研究

字·词·词典

新词语·社会·文化

中国辞书论集·1999

亚洲辞书论集

词典学与双语词典学研究

文献检索教程

20世纪中国辞书学论文索引

20世纪汉语词汇学著作提要·论文索引

长丰：“六书”名称和体系的变异

同一事物，从不同角度，可以通过研究得出不同的体系。词的书写形式，也是如此的。

战国时期，文字还基本上因袭商周传统外，六国文字有转简化，“文字异形”。包括秦隶在内，一般写作文字已经失去了形象表意特点。因而六种字调法逐渐失去了作用。在这种形势下，从字的形体上研究文字的工作随之应运而生，从而产生了从文字形体研究“六书”的流派。

汉承秦制，在篆、籀、古文（六国文字）的传承中，师说不一，“六书”观念也出现了差异。从文献看来，汉代的所传“六书”实有三派：班固、郑众、许慎。

《周礼》郑玄注引郑司农（郑众）云：“六书者，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名称、次第和班固不同。可是它的“会意”与“象意”相当，“处事”与“象事”相当，“谐声”与“象声”相当。“会”“处”“谐”都是就文字结构中的字形结构关系说的。他虽没有定义和举例，顾颉刚思意可知是就字形结构关系，而不是从字调法说的。但是，在“六书”名称上，还是因袭字调法的。和许慎比起来，可以说是一种过渡。

《说文解字序》所记“六书”，虽然也是从字形形体结构着手的，但是他与郑众不同，改变了一些名字，名实相应，改变与商周先秦形象表意相应的“六书”内容，变成了另一个体系——文字形体学体系。

首先，把“象形”与“词法”中用指示符号以见其象的字，如二、一、本、末等等提出来归为一类，而称之为“指事”。同时又把“象事”归入“象形”之中。

其次，把有借贷关系的借方“象声”字，因求别律的制约，而标注义类形象，或成非借之字，或把借方本字，加注义类，以作补偿（定字）。

如：

象——
其——

借后标类，为借方写出它自己的书面形式。

贷出补偿，为贷方标类另作新字

把已用象形、象事、象意写词时加用（或在使用后加用）象声字，使词的词义形象和语音形式同时兼见的字，如

星  
震  
藉  
宝  

把已用象形、象事、象意写词法写出之字，又重注义类形象，使原来之字变为“声”的字，如

渊  
寒  
雪  

徐灏说：寒、塞本一字。

这些字是用不同的写词法写成的。它们虽经类路不同，如果单从形式上看，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是“形”，又有“声”。

作者手迹

序

《古一汉语文学语言词汇概论》是先师孙晓野(常叙)先生四十余年前的一部著作。上世纪60年代初仅以教材的形式在校内印刷过一次,但其学术价值和影响却是远非一般的教材可比的。多年前,我去上海参加一次学术会议,在那里遇到的一位学者和我提起先生的这本书,说他年轻时读到此书时是如此受益,不忍放下,竟用了好多天的时间将它全部手抄了一遍——在遥远的上海,不知他是怎样得到这印数有限的校内排印本的。我初次读到此书是在从学于先生的80年代初,迄今又已是二十多个春秋了,然而重读这部著作,先生关于语言、词汇、文字的科学理念,渊博的学识、精辟的论述,仍然常使我震撼,使我深思。

先生于1957年出版了《汉语词汇》,《古一汉语文学语言词汇概论》是先生在《汉语词汇》出版后二三年内研究和深刻思维的成果。如果说前者为汉语词汇研究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的话,后者则表现了先生在汉语、词汇、文字等方面更具个性的学术思想。这种思想一直持续到先生的晚年,并在不断地完善着。

《古一汉语文学语言词汇概论》是为一般人掌握阅读古书的能力而作,因此,它入手不是介绍汉语的历史,也不是介绍传统的“小学”,而是讲文言词汇和现代汉语词汇的关系。从现代汉语词汇过渡到文言词汇,亲切,自然,使人易于接受。全书各章节的知识都是本着这种精神设计的。实用,是本书的一大特点。但更加引人关注的是其学术特点,谨择其要者叙之于下。

首先,是关于古代汉语性质的认识。“古代汉语”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语言?传统的说法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兴起的白话文以前的所有书面语言(包括文言文与古白话)都是“古代汉语”,“五四”以来的白话文为“现代汉语”。仅就书面语言而言,作这样的划分当然是有其道理的。但是,通常人们说“现代汉语”,是将口语包含在内的一个概念,于是有人认为与“现代汉语”相对的“古代汉语”也是这样一个概念。加之中国社会历史分期的影响,遂有人以为“五四”以前皆为“古代汉语”时期,将秦汉以后某一时期的文言等同于该时期的语言进行研究者往往而有之。胡明扬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从语音系统、助词系统、基本词汇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给汉语史分期,大致的看法是:魏晋以前是古代汉语,隋唐至明清之际为近代汉语,清初(17世纪初)开始形成现代汉语。(胡明扬《现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规范化》,见《现代汉语讲座》,知识出版社1983年8月。)这一意见是十分值得重视的。作为古代书面语言主体的文言,在我们认识汉语的历史时掩盖了许多东西。应当指出的是,早在四十多年前,晓野师即已经对有关问题作出了清晰的论述。称“古—汉语文学语言”而不称“古代汉语”的主要用意就是“为了和汉语史中的古代汉语相区别”(《总论》)。书中详细地讨论了文言词汇的特点:就词义而言,每个时代的作品中都是古今义错综使用的;就词的构成而言,由文言的以先秦口语为基础的性决定,当口语中结构造词已十分发展的时候,文言中的复音词又往往解体复原;就词汇的语音特点而言,它可以随着时代和应用地域的不同而改变自己的语音形式以适应口语;就词汇的书写形式而言,它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行调整,以当代通行的字体书写。

其次,是关于词义构成的认识。先生认为词义源于先民认识世界时在头脑中形成的事物表象或概念,当它还没有进入语言,或者还没有作为思维的语言材料时,它是潜在于头脑之中的。词义都具有多方面的属性。当它应思维和表达的需要被起用,进入语

言时,词义就进入了具体语段的对立统一环境,在语言环境的制约下,词义众多属性之一便被凸现出来。从前的字典辞书将一个词义在具体应用中所凸现的不同属性罗列起来,称为“义项”,是不符合语言的客观事实的。词在具体的应用中,往往是仅就其所凸现的某一属性而界定其意义的。因此,对于阅读古书而言,应特别强调对词与其所处的语言环境的依存关系的关注。在先生后来所作的一篇题为《词在文言作品语言中的辩证关系》的文章中,这一理念阐述得更为明晰、缜密。

再次,是写词法理论的创建。所谓“写词法”,实际上是对传统文字学“六书”理论的颠覆和在词汇学理念基础上的汉字构成理论的重建。我从先生受业,所学的主要是这一在新的理论指导下的文字学。早在1959年,先生即在他的长文《从图画文字的性质和发展试论汉字体系的起源与建立》中提出了“六种写词法”,为:象物、象事、象意、借假、形声和转注。嗣后,将“六种写词法”收入本书。80年代初,先生又对自己的“六种写词法”加以修订。取班固之“六书”说而阐发之,定为:象物、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藉。“象声”者,包含旧时“六书”中的形声和假借。“假藉”者,由一词派生出的另一词仍藉用原词的书写形式,藉者,凭藉之意也。班固的“六书”与许慎的“六书”有本质上的差别:前者代表的是先秦人写词书名的文字观念,后者则是以汉字形体为主进行研究的开始。汉字脱离汉语,具有独立的形、音、义之观念,于是乎发轫。此说创成之时,正值先生为我辈授课,即在课堂上详加阐论,此事至今仍历历在目。先生晚年,又据此对本书中的“六种写词法”做了修订。今天看来,修订工作做得并不彻底,例如后面讲古今字内容的一部分,显得与前面不协调,露出前面增改的痕迹。盖其时先生年事已高,精力已不若从前所致。

《古—汉语文学语言词汇概论》现在要正式出版了。我认为这对于词汇学、文字学、训诂学、词源学的研究,对于初学者阅读古

籍能力的培养,都是十分有意义的事。这次整理,我们仅对原书中存在的技术性问题作了处理,至于由作者增补而留下的一些痕迹,则一仍其旧。这样做的目的是尽量保存此书的原貌。如果读了此书,对晓野先生学术思想的发展获得更清楚的了解,岂非更有意义。望读者诸君明鉴。

张世超

2005年2月3日

于东北师大

孙常叙先生与古汉语词汇学研究

孙常叙(晓野)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汉语词汇学家、古文字学家。他在教学、学术研究园地辛勤耕耘了60年。孙师不但在语文科学领域取得学术界公认的科学成果,还给国家培养了众多的语文工作者,其中有不少人已经成为卓有成就的语言学专家。

孙师几十年如一日,在不断探求的道路上,用自己的勤奋和智慧,换取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汉语词汇学、古文字学和古典文学等研究领域都作出了贡献。其中许多著述具有开创性,形成自己的体系,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仅就孙师对古汉语词汇学研究的贡献,谈谈自己的体会。

孙师继在20世纪50年代发表的力作《汉语词汇》之后,于20世纪60年代初又写成姊妹篇《古代汉语词汇》。当时虽以教材的形式刊行,却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古汉语词汇学专著。孙师在论著中以他深邃的学识,融会多年的研究成果,独辟蹊径,以崭新的体系,独特的风格,使之成为古代汉语词汇学的开拓之作。

一、古汉语词汇性质的探究

孙师首先全面而系统地阐释了古汉语词汇的性质。他首先给古汉语词汇正名,认为科学的表述应该是:“古—汉语文学语言词汇。”

论著明确揭示古—汉语文学语言词汇有两大矛盾,即它和现代汉语的矛盾和它同历代口语的矛盾。在特定的矛盾关系中使其成为汉语史上一个独立的部门。

今而用古的超时代性,各代词汇的兼蓄并用,这是古—汉语言文学语言词汇的重要特征。论著指出,一部完整的汉语史,应该包括口头语言史和书面语言史。它们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既存在差别,又相互关联,彼此吸收。论著就纵的方面展示其发展演变的脉络,侧重其异。他指出,在先秦时代,书面语和口语是“基本相应,表里一体的”,即书面语源于口语。后来由于人们认识的深化,社会历史对语言的影响和要求,以及口语和书面语各自发展的特点等诸多因素,才使它们产生了距离,而且在发展进程中这种差距逐渐加大,进而分道扬镳。就横的方面论述,侧重其同,展示它们的相互关系和联系。先秦时代书面语源于口语,因而古—汉语言文学语言词汇中的基本词汇,与先秦口语一脉相承,经过长期发展,它具有极大的稳固性和生命力,从而使古—汉语言文学语言词汇“无论通过哪一个语言时代,都有和各时各地当代汉语词汇同一的部分”。这个同一的部分成为联结古—汉语言文学语言词汇和历代口语词汇的一条纽带。不限于此,除基本词汇外,作为和当代口语词汇相对的古词,在其语言形式上,也随着语言文字的发展而不间断地改变它们自身,而“从属于那一时代的当代语音系统和书写体系”。这是很重要的论断,最易被人忽略。具体说来,在语音上要适应读者时代和地方语音的变化;在书写形式上,一是各代作者都用自己时代的文字从事写作;二是在作品流传中要适应后代文字体系和字体,即传到什么文字时代,就随着变成那个时代的通行字体。

论著进一步阐述,古—汉语言文学语言词汇的兼蓄并用,表现在它随着汉语词汇的发展,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它基于先秦,但又不停滞于先秦,在传承和发展中,不断吸收各代新词新语,“从不曾停息地逐渐地丰富它的词汇”。因此,它对历代汉语都有较大的适应性。这种超时代、各代词汇兼蓄并用的性质,可以用著述中精彩而确切的论断作结:“古—汉语言文学语言词汇具有上不同于汉语口语发展的任一时期的断代语言,下不同于当代口语……同

时,又具有上通先秦,中贯各代,俯从现时的独特的语言性质。”

推陈出新的能产性,各代作家的新词创造,这是古—汉语言文学语言词汇的又一重要属性。表明它不是消极的僵死的书面语言,而深具活力。它不单是随时吸收口语词,“依靠它所经过各个时代新词的累积”,而且“通过作家作品,能动地创造新词”,即通过各代语言巨匠推陈出新的创造。论著具体地展现了新词创造的途径:以已有的文学语言词汇为基础,把它作为构成新词的素材和条件,经过加工、提炼和活用,使之成为新的词组,再通过词组形式,逐步走向新词。新词产生后,并不是最终的归宿,从语言的社会功能看,还要接受社会的检验和选择。经过一定阶段的书面应用,实践表明它符合社会要求,为多数群众所接受,于是便从书面走向口头,成为口语词。由此可见,不但以造词成果丰富了古—汉语言文学语言词汇,而且也充实了口头语言词汇。

据此,论著进而作了深层剖析,指出所创造的新词并不是等同的,它有品第之分,并依据品第决定未来的去向。大体可以分作两类词:“一类是概括力比较大,群众性比较广,符合人们认识,经过实践选择”,而进入基本词汇或常用词汇。这便是上文所论及的走向口头词汇的一类新词。另一类词则与之相反,在实践中因没有群众基础而被淘汰。但即便是二类词,也并非注定无用,经过加工改造,也有成为新词的可能。这足以证明,古—汉语言文学语言词汇具有能产性和生命力。

古今词的相对性,这是深入认识古—汉语言文学语言词汇必须看清的一点。所谓相对性,就是应该辩证地看待古今词,今里有古,古亦涵今,不可截然划分。在一定条件下,古今词可以转化,使古词成为今词。古—汉语言文学语言词汇具有两个相对关系:一是它和现代汉语的相对性;二是它和方言词汇的相对性。前者表现为古今渗透,各代口语凭藉古—汉语言文学语言词汇充实自身。一般采取两种方式:(一)拿来主义,直接选用古词,赋予新义;(二)从中提取某些成分创造新词,于是从前的古词,一变而成为新词。

后者是由于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而产生方言历史的差异。就全民通语来说,它已成为古词,但这些古词,从现实的某些方言里,可能仍活跃在人们的口语中。可见,辩证地看待古今词可以大大开阔人们的视野,深入理解古—汉语文学语言的性质。

结构造词的复原性,这是从现代汉语的角度去看古—汉语文学语言词汇。现代汉语中已经通过词组,以结构造词法凝结而成的双音节词,在用古—汉语文学语言词汇写成的作品往往又解体复原,恢复了当初词组的性质。它说明古今词尽管是相对的,但毕竟存在着新旧质的差别。古—汉语文学语言词汇是以先秦语言词汇为基础的,单音节词在整个词汇中占绝对优势。因此,作为体系来说,又是相对保守的,它常以整体的力量维系这种优势。使通过结构造词法所造成的复合词,又“融解复原”,“甚至有的新词也往往倒反为词组”。正如论著所说:“承认这一现象,并不意味着否定汉语词汇发展规律,相反地,它正可以历史地证明汉语造词法逐渐质变的事实,说明有相当部分的结构词是滥觞于词组,经过相当长的时期才被先后地逐渐地凝炼下来。”

二、建立词汇文字学的新体系

孙师对古汉语词汇学的贡献,集中体现在建立词汇文字学的构想和实践上。词汇文字学是以写词为中心立说的,而传统的文字学则是以字本位立说的。可以说这是新旧体系的分水岭。旧文字学歪曲了文字的性质,割裂了字词关系,掩盖了汉字写词的本质属性,这是问题的要害所在。

众所周知,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社会性的书写符号体系,是汉语词的书写形式。因此,汉字自身并没有音和义,它的音义是所写词赋予的。离开了它所写的汉语词,便毫无意义。正因为这样,论著批驳形、音、义“三要素”的汉字思想,指出这种汉字思想与写词说是不相容的。为了认识旧体系的弊端,论著就这种错误的学术思想形成过程,进行了人情入理的剖析。指出秦汉以前,对字词关系

是以词(名)为中心,“文字写词的思想是比较清楚的”。汉魏以后,由于文言与口语分离渐远,人们只见书面上的字义,而忽视了它所写的词,久而久之,“字音”、“字义”的观念逐渐形成,于是说“文”解“字”之风盛行,积习所致,人们“只有文字观念,并无词汇思想”。所以,要建立科学的词汇文字学的新体系,恢复字词关系的本来面貌,就必须破除字本位说的旧体系。

在此基础上论著阐述了汉字写词的基本原理,指出汉字写词是有科学的理论根据的。论著给词下了精辟的定义:“词是思想(概念)的语音物化,它是语音形式和词义内容的统一体。”正是由于词的这种音义统一体的属性,才给词的书写形式规定了选择的范围,提供了基地。凡属从语音方面着手写词的,它所建立的文字体系,是标音的音节文字或音素文字;凡属从语义方面着手写词的,它所建立的文字体系,是表意文字,而汉字是属于表意文字体系的。由此看来,汉语词的书写形式,是建立在汉语词的基础之上的,是“就词的内容——词义方面,按其足以区别于其他词的特点,用形象方法表现词义,从而构成它的书写形式的”。这是秦以前汉字写词的特点。我们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a. 词的书写形式是根据词的内容——词义构成的;b. 要抓住词义的本质特征,以便同其他词相区别;c. 采取形象的方法,写词的一般程序是:从形见义——即义识词——定词知音。

鉴于上述程序,基于形象写词的特点,将秦以前的文字称为“形象的音节表意文字”。用形象的方法勾画出词义的特点,是先秦时代写词的基本方法。它不仅体现在单词的书写形式上,也贯穿于整个汉字体系中。隶变以后,尽管失掉形象特点,但在总体上仍不失为音节表意作用,所以把隶变后的文字,称为“符号的音节表意文字”。

论著不仅阐明汉字写词的一般原理和基本方法,而且根据词的意义的语法特点,探索写词的具体条例。论著对传统的“六书”进行了必要的改造和合理的吸收,摒弃了字本位的旧体系,吸收其

中有用的分体,使其融会于词中心的新体系。从词汇文字学的观点出发,联系商周文字的实际,在前汉“六书”名目的基础上改作象物、象事、象意、形声、转注、假借。论著指出,在这六种写词法中“象事也是具体形象的勾画,它和象形只是物象和事象上的差异”。可以把它归于象形,再从象形里分出象物和象事两种写词方法。对“象声”则不取,因为它不能显示形音作用,不如“形声”概括力大。还必须看到,这六种写词法,不单象物、象事是用形象方法写成的,就是其他四种也是在形象写词的基础上完成的。其中象意法“是用具体的事物形象表现抽象的概念”,并不直接显现词义,而是通过联想,曲折地表现词义。形声结构是最能产的,它的内部是由“声”、“形”两部分构成的。它用形符标示词义所属的物类或事类的类属形象,利用象形字,以其音义统一关系,作为标音的声符。至于转注写词法,历来众说纷纭,立说如林。论著从写词出发,加以新释。认为转注仍以象形为主,它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在前四种写词法的基础上,就已成的形式给予部分改变;二是在语音形式上也作相应的调整,以区别分化后的“老”、“考”。它和象意法有近似,也有差异。在利用已成字形上二者有相似点,在是否利用原词语音上又存在差异。假借写词法是借用同音词的书写形式来写所要表达的词,论著通过与形声结构的比较显示它的特点。利用早期汉字形象的音节表意作用,在词的音义统一关系的基础上,从同音词汇中选取一个词的书写形式,依靠具体的语言组织,摒弃所写的词义,使它只起标记音节的作用,这是它们相同之处;所不同的是,假借写词法在向同音词借来书写形式之后,原形照用,而形声写词法却在同音词的书写形式上,添加一个表示词义类属的物类或事类的形象,以示区别。

三、词义学说的独创性

孙师对古汉语词汇学的又一贡献,就是他的独创性的古汉语词义理论。60年代初,当古汉语词义学尚处草创阶段时,他所提